



明豆

蠶豆

古籍整理與版本學

高粱

茱萸

木耳

旱

駱偉

芝麻

菠菜

葱

韭

蕪菁

瓜

茺蒿

生花落

蘑菇

玉蜀黍

松

茺蒿

胡椒



茭白

菜瓜

金針

蒜

山藥

諸甘

苜蓿

蓴

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編

瓜

辣

葡萄

簡明古籍整理與版本學

駱偉著



澳門理工學院圖書館

Biblioteca do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Macau Polytechnic Institute Library

致意 Com os melhores cumprimentos
With compliments



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

二〇〇四年

簡明古籍整理與版本學 / 駱偉著。—

澳門：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2004

面：表，圖；23公分

ISBN 99937-31-05-6

I. 簡... II. 駱... III. 古籍—版本學—中國 IV.G256.22

011.5 (中國圖書分類號)

書名：簡明古籍整理與版本學
作者：駱偉
統籌：王國強
主編：梁德海
編輯：羅瑞文、潘雅茵、林金霞
版面設計：黃潔碧
封底刻印：西冷印社
出版：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
版次：初版
出版日期：二〇〇四年八月
印刷：光大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發行數量：一千冊
國際書號：ISBN 99937-31-05-6

序 言

中山大學駱偉教授長年對祖國古籍文獻進行研究，學養功深；對古籍特藏更深具見地。現將其所得輯錄成書，無疑對古籍研究起承先啟後作用。

本書共分八章，由古文獻的定義起介紹，以綜合古籍的歷史知識為終，層次分明，脈絡結構合理。不僅可作為相關學科及研究交流的主要材料，更是建設圖書館中國古籍特藏的重要參考資料。

自本世紀初，澳門圖書館界即掀起一片對地方文獻及古籍整理的學習熱潮。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為此曾邀得兩岸三地的學者賜稿，輯成《兩岸三地古籍與地方文獻》一書，頗受同業重視。現蒙本書作者厚愛，將其著作交由本會出版。榮幸之餘，樂為之序。

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理事長 王國強

目次

序言	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古籍的稱謂與定義	1
(一) 古籍稱謂	
(1) 典籍	
(2) 墳典	
(3) 書策	
(4) 書籍	
(5) 圖書	
(6) 書	
(7) 文獻	
(8) 古籍	
(二) 古籍定義	
第二節 古籍類型的演變與發展	4
(一) 甲骨文獻	
(二) 青銅文獻	
(三) 石刻文獻	
(四) 簡牘文獻	
(五) 縑帛文獻	
(六) 玉版文獻	
(七) 寫本文獻	
(八) 雕印文獻	
(九) 活字排印文獻	
(十) 稿本文獻	
第三節 古籍的版式與外形結構	13
(一) 古籍的版式	
(二) 古籍的結構	
第四節 古籍的裝幀形式	14
(一) 卷軸裝	
(二) 經摺裝	
(三) 旋風裝	
(四) 蝴蝶裝	
(五) 包背裝	

(六) 線裝	
第五節 古籍用紙.....	18
(一) 藏經紙	
(二) 椒紙	
(三) 麻紙	
(四) 繭紙	
(五) 麻沙紙	
(六) 羅紋紙	
(七) 藤紙	
(八) 桑皮紙	
(九) 棉紙	
(十) 梗棒紙	
(十一) 竹紙	
(十二) 玉版宣紙	
(十三) 毛邊紙	
(十四) 開化紙	
(十五) 太史連紙	
(十六) 粉連紙	
(十七) 洋粉連紙	
(十八) 山貝紙	
(十九) 遷安紙	
(二十) 高麗紙	
(二十一) 日本皮紙	
(二十二) 美濃紙	
第六節 古籍皮藏.....	20
第二章 古籍整理內容.....	25
第一節 古籍編目及其前提條件.....	25
(一) 確定著錄規則	
(二) 確定分類表	
(三) 確定著錄級次	
(四) 確定著錄文字	
第二節 古籍辨偽.....	27
第三節 古籍校勘.....	27
第四節 古籍考證.....	28
第五節 古籍輯佚.....	28
第六節 古籍注譯.....	29

第七節	古籍編輯.....	29
第八節	利用現代新技術整理古籍.....	30
第三章	古籍著錄.....	31
第一節	古籍著錄項目.....	31
	(一) 書名與卷數	
	(二) 著者項	
	(三) 著作方式	
	(四) 版本項	
	(五) 載體形態項	
	(六) 叢書項	
	(七) 附註項	
	(八) 提要項	
	(九) 排檢項	
	(十) 著錄項目識別字與著錄內容識別符	
第二節	古籍著錄內容要點.....	33
	(一) 書名項	
	(二) 卷數著錄	
	(三) 著者項	
	(四) 版本項	
	(五) 載體形態項	
	(六) 附註項	
	(七) 提要項	
	(八) 排檢項	
第三節	古籍分類.....	40
第四節	目錄組織.....	40
第四章	古籍版本學.....	41
第一節	版本與版本學.....	41
	(一) 版本與版本學的定義	
	(二) 古籍版本學的主要研究內容	
第二節	古籍版本類型與特徵.....	44
	(一) 古籍版本的類型	
	(1) 以出版時間區分	
	(2) 以出版地區區分	
	(3) 以出版單位區分	
	(4) 以印刷方式區分	

- (5) 以雕印先後區分
- (6) 以印刷質量區分
- (7) 以印刷後加工區分
- (8) 以印刷顏色和字體大小區分
- (二) 各朝代版本特徵
 - (1) 宋刻本
 - (2) 元刻本
 - (3) 明刻本
 - (4) 清刻本
 - (5) 活字本
 - (6) 石印本

第五章 古籍版本的鑒定方法.....	79
第一節 版本鑒定的工作程序	79
第二節 版本鑒定的基本方法	79
第三節 古籍版本鑒定應注意的問題.....	87
第四節 關於“藏版”問題.....	91
第五節 鑒定版本的主要參考書	91
第六章 古籍的典藏和閱覽	93
第一節 古籍典藏	93
第二節 古籍保護	93
第三節 古籍修復	94
第七章 古籍的現代化與數字化	95
第八章 古籍的一般歷史知識	97
附 錄	99
(一)《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分類表	
(二)《四庫全書總目》分類法與《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對照表	
(三)清嘉、道以來少見或精刻印本知見書目	
(四)清代以來嶺南文獻待徵錄	
主要參考文獻	
後 記	11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古籍的稱謂與定義

(一) 古籍稱謂

古籍，中國古代書籍的簡稱。她是我國古代先賢的智慧結晶，是我國歷史發展的記錄，也是我國歷代文明的產物，更是我國文化遺產的瑰寶。古籍，由於時代和載體的不同，於是便衍生各種名稱，主要有：

- (1) **典籍**：古代稱圖書為典籍。如《尚書·序》說：“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孟子·告子下》說：“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後來，典籍成為掌管圖書之官職，如元、明朝置“翰林院典籍”官。
- (2) **墳典**：古代指“三墳”（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即易、詩、書、禮、春秋）之書，後泛稱古籍。如《南史·丘巨源傳》一書稱：“居貧屋漏，恐濕墳典。”
- (3) **書策**：秦漢及秦漢以前，古代以竹簡寫書，故稱書策。如《禮·曲禮》一書說：“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遇之，戒勿越。”
- (4) **書籍**：古代對圖書又一稱謂。如《廣博物志》說：“道武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何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
- (5) **圖書**：古代對圖書的認識，一為書籍，或帶圖文並茂的書；二為地圖之書。故《史記》稱：“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
- (6) **書**：以文字記載事物的稱之為書。如《說文解字敘》稱：“箸於竹帛謂之書。”《史記》，唐司馬貞索隱又說：“書者，五經六籍總名也。”
- (7) **文獻**：文獻一詞，出於《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後來，宋代朱熹解釋：“文，典籍也；獻，賢也。”因此，古代稱“文以載道，獻以傳賢。”唐宋以後，把“文獻”作為諡號或書名，蔚然成風。如唐宰相張九齡，死後諡號“文獻”，人稱“張文獻公”。元代學者馬端臨著作，稱《文獻通考》等。現代，文獻概念更為廣泛，包括古今中外、不同類型出版物和不同文種著作，皆稱文獻。
- (8) **古籍**：此稱謂產生較晚，但究竟出於何代？至今似尚無人考究。據筆者推研“古籍”一詞，是在紙張和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後才有的。如《隋書·經籍志》說：“克平偽鄭，盡取其圖書及古籍焉。”後來，清代《四庫全書·凡例》又說：“今詔求古籍，特創新規。”

可見，從隋朝到清朝，已經沿用“古籍”這一名稱了。隨著時移世易，現在所稱古籍，主要指寫成或印刷於1911年前並能反映我國古代文化、具有傳統裝訂形式的書籍。

……

(二) 古籍定義

上述古籍的稱謂，反映了人們對不同時代和不同載體的理解。然而，近年來，由於新型文獻載體的出現，特別是縮微膠卷(片)和電子出版物的問世，使古籍載體類型日益增多，於是，對古籍的概念，又有幾種不同標準和意見：

- (1) 以文獻內容：即文獻內容是古代的，不管它是古今中外出版的，都是古籍；
- (2) 以著者時代：凡是古人編撰的圖書，不管它什麼時間出版，都是古籍。
- (3) 以文字語言表達方式：凡用古漢語言文字寫成的書，也是古籍。
- (4) 以裝訂形式：凡線裝書都是古籍。
- (5) 以成書年代：凡在1840年(鴉片戰爭)或1911(辛亥革命)或1919(五四運動)以前寫成的書，都為古籍。

上述幾種說法都有一點道理，但也有問題。如以內容，今以中山大學王起主編《金元戲曲》、姜伯勤著《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胡守為《嶺南古史》、黃啟臣《澳門通史》以及近年編輯出版《全唐詩》、《全宋詞》，豈不都成了古籍？以著者時代定論也有問題，如中華書局校點(漢)司馬遷等著《二十四史》、黃國聲、鄧貴忠校注(明)郭棐《粵大記》、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校點清代《車王府》等，豈不又成了古籍？以古代文字寫的書，近現代人也有不少，如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徐信符《歷代文體辨別》、臺灣屈萬里先生《書傭論學集》等，也為古籍？若以裝訂形式作劃分標準也有問題，古籍裝訂不僅有線裝，也有卷軸裝、旋風裝、經折裝、包背裝、蝴蝶裝等。現今出的書，有不少也有用線裝形式的，如《魯迅全集》、《毛澤東選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如當古籍不合適。對古籍的定義，很難用一種標準界定，應綜合考慮。因此，對古籍定義的界定，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古籍著錄規則》作了解釋規定：“古籍，中國古代書籍的簡稱，主要指書寫或印刷於1911年以前、反映中國古代文化、具有古典裝訂形式的書籍。”這裏對古籍形成的時間、內容和裝訂形式三個方面作了綜合、統一的規定，界線比較明確，掌握較易，也較符合古籍的要求。因此，較為我國各類型圖書館所接受。但近年來，在實踐和工作過程中，也遇到和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民國初年的圖書，它們的內容和裝訂形式都符合古籍的條件，只是印刷時間稍晚了一點。如國學大師王國維撰《靜庵文集》，為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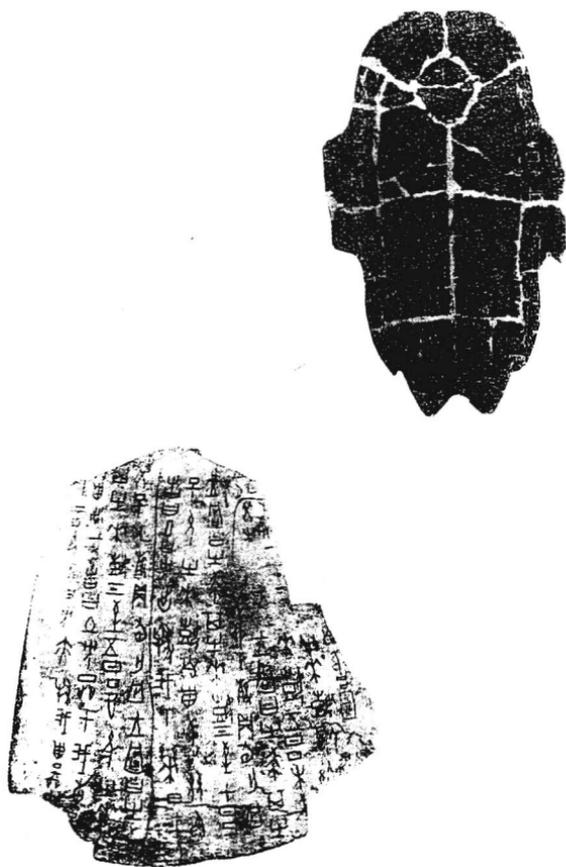
緒三十一年（1905）鉛印本，按古籍標準可入古籍範圍。但王國維的《觀堂集林》，在民國十二年（1923）才出版，這就被排除在古籍之外，類似這種事例還很多，即同一人的著作，有的入古籍，有的不入古籍，這是說不過去，也不好處理的。其次，近幾十年來，重新出版（影印、重印、電子版）、校點、注釋、並按古典裝訂的古人著作，如《二十四史》、《紅樓夢》、《西廂記》以及近年影印出版《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這些都是過去有名的古籍，現為了滿足社會需要而重新出版，且又是線裝形式，圖書館如把它們歸入古籍書庫，又不符合出版時間標準，放在新書庫，與現代人著作混排在一起，又很不協調。這種時人稱之為“新古籍”、“新善本”，確實不好處理，需要妥善、慎重解決。

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紀了，距離1911年已近百年。因此，我認為，國家頒佈的古籍標準，各館可根據自身情況，適當放寬。如藏古籍幾十萬冊以上的圖書館，可依國家標準，但藏古籍量稍少的圖書館，可適當調整。具體意見如下：

- (1) 清末民初學者，如王國維、羅振玉、章炳麟、劉鶚、孫怡讓、徐世昌、徐乃昌、葉德輝、柯劭忞、嚴復、張元濟、陶湘、丁福保、倫明、黃任恒、汪兆鏞、潘飛聲等，其著作在抗日戰爭之前（1937），用線裝形式出版者，可作古籍。
- (2) 幾部大叢書的影印本。如商務印書館分編影印且用線裝形式出版《四部叢刊》（1919年）和中華書局編印用線裝形式出版《四部備要》（1920-1936年）以及中華書局縮印用線裝形式出版《古今圖書集成》（1934年）等，可作古籍收藏。
- (3) 凡清代及清代以前人的著作，現通過編輯、影印、輯佚、校注、考訂且用古典（線裝等）形式出版者（不論時間），亦可作古籍。但今人如毛澤東、郭沫若等的著作，雖用線裝形式出版，則除外。

第二節 古籍類型的演變與發展

(一) 甲骨文獻(夏、商、周)：即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書(見下圖)。內容大多是商王朝當時占卜的記錄。因此又稱“卜辭”，它是我國現知最早的書，於1899年在殷代首都的廢墟(今河南省安陽市郊小屯村)被發現。因此，稱殷墟甲骨或“甲骨文”、“契文”、“商代文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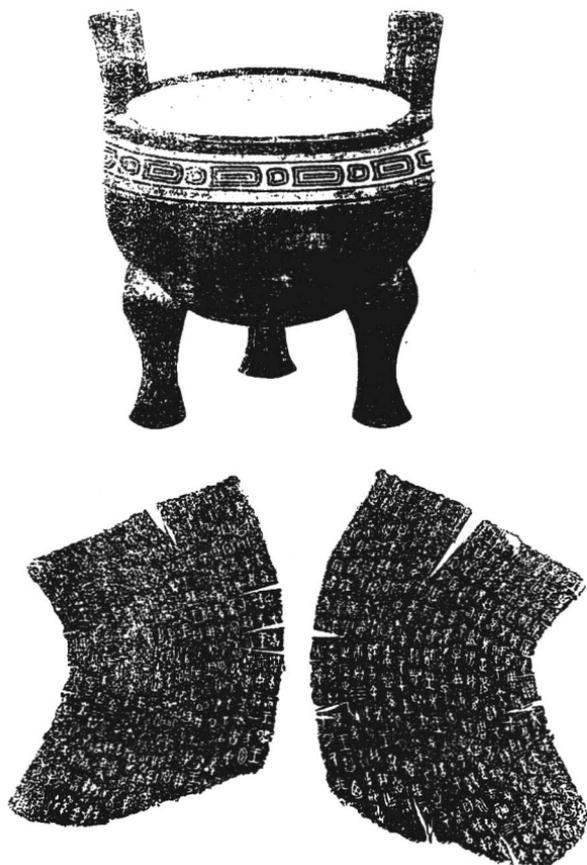


我國自發現甲骨以來，已整理出版一百多種書刊文獻，對甲骨文獻和殷代社會及其歷史的研究，起了極大的作用。1973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在河南安陽縣小屯村南進行考察發掘，出土了近5000片刻辭甲骨。這批卜骨文獻，對甲骨的分期斷代研究有重要意義；1977年，在陝西岐山、扶風兩縣之間的“周原遺址”，出土了一批西周甲骨，共有17000多片，其中有刻字的近200片(全是記事刻辭)，這是西周甲骨發現最多最重要的一次，曾轟動了學術界。這批甲骨的發現，否定了甲骨文全是占卜辭之

說。同時，這批甲骨有穿孔並有“典冊”的記載，從而說明周代已把甲骨文獻串連成冊，印證了《尚書·多士》“維殷先人，有典有冊”的說法，並作為檔案加以保存。此外，在山西、陝西和北京昌平等地，也發現過周代甲骨。

我國先後產生了一批甲骨學的著名學者，如號稱“四堂”的學者，即王國維（觀堂）、羅振玉（雪堂）、郭沫若（鼎堂）、董作賓（彥堂），此外，還有劉鶚、孫怡讓、容庚、商承祚、胡厚宣、李學勤、王襄、陳夢家、饒宗頤、葉玉森、裘錫圭、柯昌泗、柯昌濟、陳邦懷、陳邦福、于省吾、曾憲通、陳煒湛、金祥恒、王禹信、徐仲舒、王獻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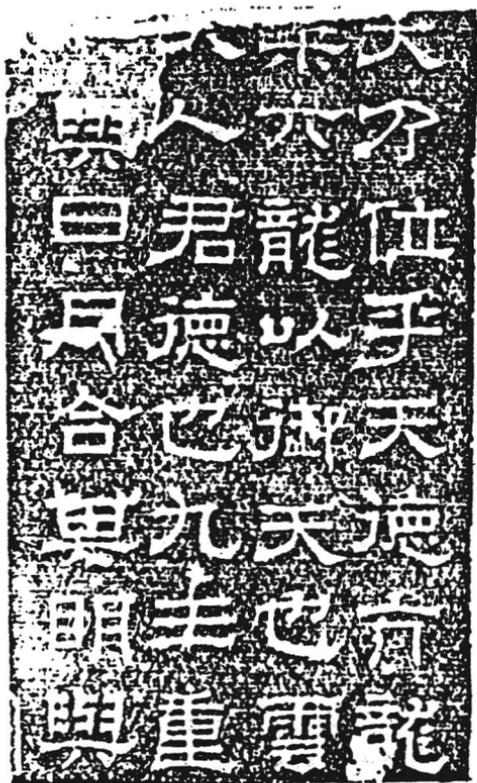
（二）青銅文獻（商至漢）：古代把文字刻或鑄在鐘、鼎等各種青銅器上，主要用作記事和紀功。這種文字，古稱“銘文”或“金文”，亦稱“鐘鼎文”。西周著名的《毛公鼎》（如下圖），銘文近500字，記述了周宣王誥誡和褒賞大臣毛公諝的事跡，反映了當時西周政局動蕩的情況。



後到春秋戰國時期，統治者甚至把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周知全國。近幾十年來，各地出土的青銅器甚多，僅陝西周都岐邑從1952-1973年，就出土西周青銅器170件；又如1983年在廣州發掘了南越王趙昧墓，出土青銅器72種2852件；1989年在江西新幹縣大洋洲發掘的商代墓，出土了480多件青銅器，在器類組合、器物造型、器表裝飾等方面，均有鮮明特色。此為我國南方考古的兩次重大發現。在近50年來出土的青銅文獻中，最具代表性的，為1992年出土於陝西長安縣申店鄉黑河工地的“吳虎鼎”，記錄了周宣王對大臣吳虎封授土地的禮儀過程；1992年至1993年，在山西侯馬市曲沃、翼城縣的“曲邨遺址”的北趙晉國墓中，出土了一批舉世矚目的珍貴文物，其中有記有各代晉君的名號和有銘文的“楚公逆編鐘”；1986年出土於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的“克罍”，記載了周成王封太保召公元子克為燕侯，而就封北燕的事。此外，還有在江蘇丹徒出土的“宜侯矢簋”以及他地的“大孟鼎”、“獻侯鼎”等等。199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國青銅器全集》，內收青銅器甚多，以近年考古發掘精品為主，傳世精品為輔，尤以反映齊、魯、燕、中山侯國等出土的青銅器為多，是出土青銅器和青銅文獻的總匯。2000年4月至今，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廣東博羅挖掘了省內最大的春秋時期的墓葬，出土了不少青銅、鐘和鼎，（該地早在1985年已出土了7件青銅編鐘），使古文獻記載先秦時代縛婁古國之迷逐步揭開，證明嶺南也存在著“青銅時代”。

我國著名的金文學者有：王國維、羅振玉、孫怡讓、容庚、商承祚、張振林、陳夢家、李學勤、馬承源、徐仲舒、饒宗頤、王禹信、曾憲通、陳焯湛、王獻唐等。

（三）石刻文獻（商至唐宋）：在石頭上刻文字，就成石刻的書。它是雕版印書的前驅。現存較早的實物是秦代石鼓，也是作為表功紀事的一種方式，後來出現多種形式。如刻在山崖上的，叫“摩崖”；刻在長方形石頭上的，叫“碑”；刻在圓形石頭上的，叫“碣”。從東漢末年起，開始把整部書刻在石頭上作為讀物的是“熹平石經”，兩晉隋唐時，又出現了佛經與道學的刻石。由刻石而導致“拓石”技術的出現。人們用紙將其拓下來，就稱為“搨本”。由拓石再結合印章技術，而引發了雕版印刷術的發明。這是一種取材方便又利於長期保存的文獻載體之一。秦漢以來，石刻逐漸取代了青銅文獻的主導地位。古代有著名的《石鼓文》和《十三經》刻石（如漢熹平石經、曹魏正始石經、唐開成石經等），是保存古代儒家經典的一種方式（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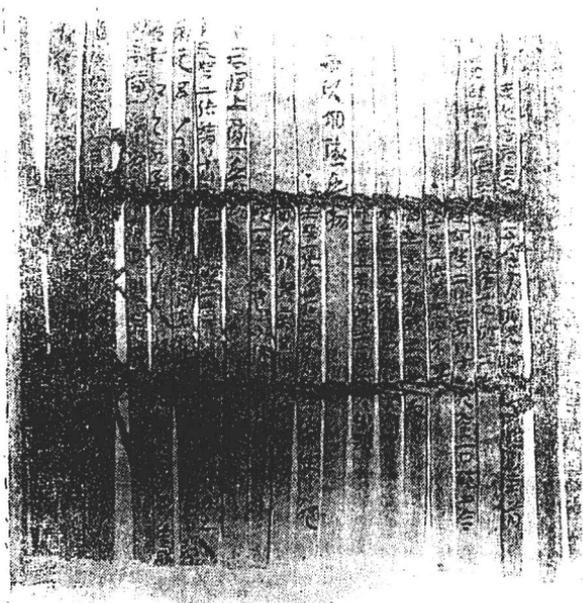


漢熹平石經

近五十年來，出土石刻數量很多，從文獻角度看，應以碑、志為主。如1974年在內蒙寧城縣出土了《大王記結親事碑》，記載了當時通婚聘女的習俗，是研究遼代社會生活的重要資料；1998年初，甘肅武威出土了《大唐上柱國翟公墓志並序》，記載了唐代翟舍集生平及家人情況；同年初，山東蒼山縣出土了明代戚繼光所撰《明誥封照毅將軍錦衣衛都指揮僉事文山趙公墓誌銘》，記載了明初趙瑛父子，因屢立戰功，被封世襲千戶的事跡；1988年，在江西德安縣發掘的南宋周氏墓中，出土了一塊天文圖碑和一幅彩繪星宿圖，主要記錄了銀河系中57顆星辰及兩側分佈行雲，對研究天文學有重要意義。此外，上世紀80年代初河南洛陽邙山出土一批碑誌，被譽為“地下碑林”；陝西蒲城縣出土了唐《高力士碑》以及江蘇太倉發現《歸去來辭》碑等等，此類文獻出土為數甚多，不勝枚舉。

（四）簡牘文獻（殷商至東晉）：用竹片寫成的書叫“簡策”，用木片寫成的書，叫方版或牘。簡牘大約出現在商朝中期（約公元前十三、四世

紀)。作為圖書的主要形式而通行於春秋末年至東漢之間。近年在湖南長沙、甘肅居延、江蘇尹灣、山東銀雀山等地出土簡牘較多，對考察研究古代歷史與文化有重要價值，曾震驚中外（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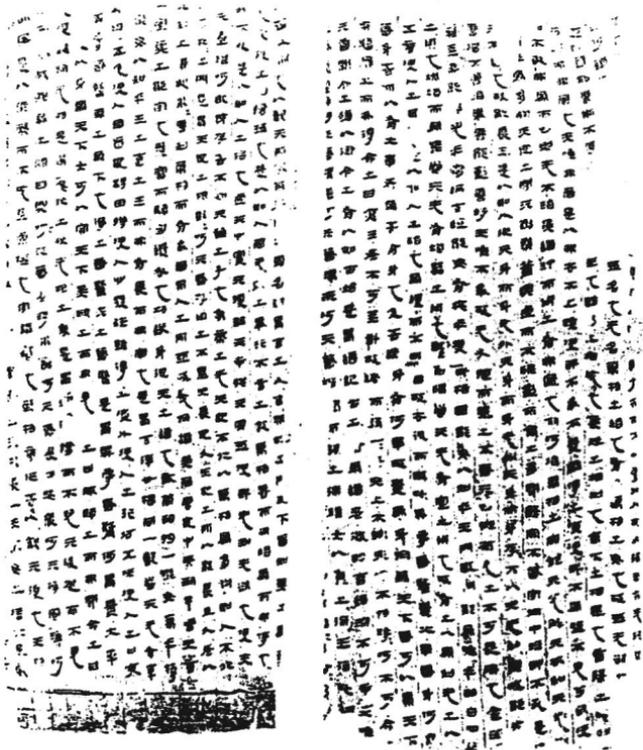


東漢永元五年編簡

我國自古以來，就不斷發現簡牘文獻，先後整理了《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著述，並一直流傳至今。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曾三次大規模發現地下竹簡，震驚中外。如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4972枚竹簡，其中有4部軍事著作和1部天文曆法著作，極具學術價值；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對甘肅居延進行調查和發掘，結果獲得漢簡2萬多枚，其中包括完整和較完整的簿冊70多種，內容十分豐富，為研究秦漢史提供了新的翔實資料；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1155枚，是我國首次發現的秦簡，內有10種為史學、法學、文學和政書類著作，為研究秦代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貴資料；1996年長沙再次出土17萬餘片三國孫吳紀年的簡牘，出土數量之多、內容系統完整、特徵顯著，實屬罕見，堪稱三國時代考古的驚人發現，被列為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同年，江蘇東海縣尹灣出土了24方木牘和133枚竹簡，內容有關西漢末東海郡農業情況，尤其是木牘《集簿》所記載宿麥種植面積，為迄今漢史資料所僅見，彌足珍貴。此外，在長沙馬王堆、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以及甘肅武威旱灘坡等，均發現了此類文獻。

(五) 縑帛文獻(春秋戰國至東漢)：用縑帛寫成的書，叫帛書。縑是微黃色的細絹，帛是絲織品的總稱。用縑帛作書寫材料，始於春秋戰國時代(約公元前四、五世紀)。其優點是柔軟輕便，可捲舒，但它是古代一種價格昂貴的奢侈品。(見下圖)。

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帛書



這種縑帛文獻，迄今僅在湖南有所發現。早在1942年和1949年，先後在長沙出土過帛書，但數量很少，影響不大。1972年至1974年，在長沙馬王堆三座西漢墓中，出土3000多件文物，內有26種12萬多字的縑帛文獻，這是我國重大考古發現之一，引起全世界的關注。這批數量眾多的縑帛文獻，包括古代哲學、歷史、地理以及天文曆法、醫學等多學科內容，許多在《漢書·藝文志》都未見著錄，十分珍貴。這批文獻數量多，內容豐富，被稱為我國“地下圖書館”。

(六) 玉版文獻(春秋戰國)：我國古代文獻中雖然有“玉版”、“玉機”、“玉冊”的記載，而留存的實物十分稀少，這些實物只有幾個字，甚